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角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使命

侯慧艳

(盐城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文化与人、文化与社会、文化与历史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本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立场观点方法,守正创新,提出“文化自信”“文化领导权”“两个结合”等重大概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条件下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新的文化理论成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指南。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完全独立、科学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方法论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使命。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使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5)05-0142-08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社会意识,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对社会存在即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进行能动的反映并发生反作用。“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①“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分工也发展起来”,但是,“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②。任何社会的建设必然包含文化建设,任何社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发展。文化建设滞后,会对整个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约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如何始终以先进文化回应时代发展要求,如何让人民群众在物质富足的同时实现精神富有,如何使中华文明实现文明更新和历史接续,这是党必须回答好的重大理论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新时代文化工作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意识形态、舆论斗争、中国国际话语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传承、民族文化认同和精神独立等一系列文化问题和文化工作进行了分析、论述和布局,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2023年10月初,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是党领导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文化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文化视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现象,科学回答了文化的基本问题,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守正创新,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基本问题的坚持和发展。

(一)文化与人

收稿日期:2025-06-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A032);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项目(思政专项)(2021SJB1027)

作者简介:侯慧艳(1980—),女,黑龙江鸡西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页。

“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说明文化问题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认为,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同时也改造自身的结果。这点明了文化的本质。人是文化的主体,是一切文化的创造者和发展者,人的实践活动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根源。然而,人的文化主体性并不意味着人的文化主体性意识的必然性。在阶级社会以前的人类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活动并未能充分区别开来,人们创造文化但并不了解文化的存在,更无法理解自己的文化主体性。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原因,使文化在一种“异化”的状态中发展:一方面,社会当然的文化主体是广大劳动者,却被统治阶级人为地剥夺了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并非文化主体,却按照自己的利益要求控制和垄断了文化的生产。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生产力极大发展,整个社会从阶级分立状态中解放出来以后,人们才能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将社会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推动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从而实现自身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文化与社会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文化,必定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结果。社会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①“因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即使能创造使用价值,也既不能创造财富,又不能创造文化。”^②

文化对于社会发展具有强大的反作用,先进的文化促进社会发展,而落后的文化阻碍社会进步。不同文化对于社会的反作用有所不同,其反作用的方向取决于文化中的意识形态,而反作用的大小则取决于文化被群众接受的程度。

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中直接反映社会经济要求,特别是经济利益冲突的内容,是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的人们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利益要求在观念上的反映。意识形态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主要是因为其所产生和建立的生产关系相对于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当一种意识形态所产生的生产关系适合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这种意识形态就具有历史的进步性,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反之,就不能促进甚至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意识形态决定着文化的前进方向,也标示出文化发展运动的历史方位。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中每一特定历史阶段都有多种生产关系并存,因此,相应地,意识形态多元化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但由于一个社会中同时存在的多种生产关系中,必然地总有一种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所以一个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又只能是一元的。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③在一个社会的多元化的意识形态中,只有主流意识形态才能规定社会文化有机整体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

不过,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要它的意识形态也占据主流地位,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是因为,“由于物质力量对精神力量的最终决定作用不是线性关系,意识形态只能或快或慢地反映经济基础的现实变革,所以不仅一个阶级要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历史过程,而且即便这个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它要将自己集团的思想理念确立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也要经历一个人所共知、接受认同的传播教化过程”^④。所以,一种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除了要以它所产生的那个生产关系的普遍发展为客观前提,还要在与其他意识形态的激烈社会竞争中实现。这种斗争的成败是由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冲突的程度、文化传播教化的能力和水平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地位根本上要以经济条件为基础,但又不是绝对以经济条件为根据。实际上,每一个利益群体都会努力借助各种文化载体向社会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达到最大程度争取社会支持的目的。每个利益群体都会积极利用文化对于经济基础的强大反作用,调动整个社会的能动力量为推广自己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页。

④李慕:《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个人思想行为的价值理路》,《思想战线》2023年第4期。

生产关系开辟道路。所谓“文化的颠覆”,就是指主流意识形态的转换。意识形态竞争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密切关系着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习近平屡次强调“不要犯颠覆性错误”,其中重要的指向之一就是文化的颠覆。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①马克思主义认为,先进文化也可能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对社会发展起到实际的推动作用,但前提是这种文化能“掌握群众”,即取得群众的广泛认同从而指导人们齐心协力为共同目标奋斗。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不仅可以教化个人,还可以组织社会。然而,意识形态是否能顺利“掌握群众”而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先进性,还受其文化形式的影响。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先进的意识形态只有与群众普遍接受的文化形式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掌握群众”,从而指导群众形成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实践。

(三)文化与历史的关系

文化是历史延续的成果,历史是文化生成的过程。文化的存在,既能证明历史的存续,也能将历史和未来接续。然而,文化相对于历史又不是完全同步的,它在历史中表现出一种积极能动的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意识相对于社会存在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突出地表现在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方面的不同步性,即文化可能超越或者滞后于同时代的社会条件。这种文化与社会不同步性主要源于人对于事物发展规律的掌握程度及由此形成的对历史发展的科学预见水平的不同,在阶级社会中,也受到不同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局限。各种不同水平的文化都可能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尽管有些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文化最终要被历史淘汰,但它的影响力不会自然而然地消失。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发展在文化领域表现为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竞争过程。如果先进文化总是不能在竞争中战胜并取代落后文化,那么历史的延续也便停止了。正如毛泽东所言:“反动文化……,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②

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文化具有独立的历史继承性。文化是人所创造的精神产品,属于社会意识领域,但是,文化一旦形成便不再只是社会意识,而是包含社会意识内容的社会存在。承载文化的物质载体如书籍、文字、录音、图像等使文化经常可以不必经过社会物质生产领域而只通过人际传递的形式保存下来。先进文化具有独立的历史继承性,落后文化也同样具有独立的历史继承性。这使人类文化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同时,也显现出愈加复杂的局面。每一个新的时代里的文化不一定是新文化,必定有旧文化存于其中,同时,旧文化又可能以新的形式重新展示自己。

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及其结果给特定时代的人们提出了文化选择的问题,即应当肯定和接受或者否定和摒弃什么样的文化。文化选择既是价值问题,也是科学问题。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了真理和价值的统一,主张对一切人类文化进行批判性继承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这是基于科学的批判过程对具有先进性的和历史发展价值的文化进行继承,是符合历史和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且有选择的继承。当然,文化继承不等于文化挪用。文化创新是继承的必要结果。对于承袭下来的文化进行批判性的转化和创新是一个社会向前发展必不可少的能力和要求。失去了文化批判和发展的能力,文化继承就变成了后代对前代的文化挪用,社会也必然是停滞不前的。

文化与人、文化与社会、文化与历史的关系,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全部问题,却是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科学回答,规定着人们关于其他文化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是科学观察和分析现实文化建设问题的逻辑起点。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坚持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文化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成就,思想认识逐渐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日臻完善,“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

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最新理论成果。

(一) 提出“文化自信”,形塑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内核,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呈现和高度概括,是文化自信的精神产物、实践成果、价值依托^①。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实现精神上独立自主的结果,是人们对于本民族的历史自豪感、现实认同感和未来期待感的集中体现。坚定的文化自信离不开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加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步伐,以意识形态建设为根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为核心,加强理论、制度、教育、学术、艺术、传播等各方面各领域文化建设,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符合新时代社会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推动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日益增强。

习近平文化思想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文化主体性问题进行了更深入且更富有针对性的阐述。第一,指出了文化主体性的内涵即“文化意义上的坚定的自我”^③,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④。文化主体性是文化生产者对自己生产精神产品的作用、水平、方法、责任等一系列问题的积极的自我意识。强调文化自信,就是要强调文化主体对自己进行文化生产的能力和水平的认可,这种认可不仅是指个人对自我的文化认可,更重要的是个人对自己所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认可。这一论述兼顾了文化与人、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双重的辩证统一的关系。第二,指出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特点即“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⑤,正是这种文化主体性奠定了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特别是在近代遭遇百年历史危难的条件仍能顽强延续的基础。这一论述指出了文化的历史性并强调了文化在历史发展中表现出来的积极能动力量。第三,指出了近代以来在艰难历史环境中,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得到守护和巩固的基本条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这一系列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关于人是文化主体和决定因素基本观点的坚持和发展。

(二) 提出“文化领导权”,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⑥新形势下,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意识形态竞争成为国家间博弈的主要领域,文化渗透成为各国博弈的主要手段,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都变着戏法包装宣传自己,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面临着新挑战。同时,网络科技的进步不断开辟新的文化竞争场域和方法,如何牢牢掌握制网权、在文化竞争中维护好社会主义国家的舆论阵地和意识形态安全,是党和人民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面对严峻的形势,习近平严肃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也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⑦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⑧。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⑨的问题,并进行专门论述。2018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用“九个坚持”概括我们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第一

①杨林香,郑梅萍:《文化自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内核》,《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②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③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④《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44页。

⑤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页。

⑦《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

⑧《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5页。

⑨《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9页。

条就是“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①。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第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②命题。从“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到“党的文化领导权”,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不但突出了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宣传思想文化建设这个党的文化领导工作的大问题,而且通过一个“权”字,说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竞争的关键性,指出党的文化建设工程的斗争性质。

毛泽东曾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③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抢占了真理和正义的制高点,掌握了思想文化的领导权,从而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更加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全党全国人民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党执政所依的群众基础的精神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全国人民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一方面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给国家发展装上了重要的“稳定器”,一方面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科学的历史认知和坚定的历史自信解决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问题,构筑中华各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这些举措既维护了社会安定,巩固了民族团结,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优势,也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坚持和发展。

(三) 提出“两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关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深刻洞察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形成“两个结合”重大命题。“两个结合”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为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更加科学更加完善的方法论,意味着党的理论创造性、文化主体性、精神独立性的新的升华,标志着党在文化建设规律认识方面走向成熟。

理论是文化的一种抽象形式,没有与其他各种具体文化元素的充分结合,就会失去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的载体,甚至被束之高阁。意识形态要深植于文化之中,就不应当只有理论这一种抽象形式,还应具有可被社会广泛接受的各种具体文化形式,从而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民族化时代化并对社会发展起到指导作用。“第二个结合”就是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际需要而提出的,这是对党在中国条件下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进一步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在中国实际中进行时间和空间的拓展,这种拓展一方面要在内容上表现出对中国问题的合理解决,另一方面要在形式上表现出与中华文化的充分融合。让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变成现代的,成为党进行理论创新并引领文化创新的关键所在。

“第二个结合”理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首先,“第二个结合”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丰富,何者为“精华”,何者为“糟粕”?评判的标准应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才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体”,这是对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沧桑累积的进步性的科学提炼。其次,“第二个结合”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性质,即“有机结合”。习近平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⑤“有机结合”一方面在于“结合”不是简单相加,而是相互影响,另一方面在于“结合”造就的不是静态的客体,而是动态发展的活力焕发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再次,“第二个结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社会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新起点。“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创新,同时,作为一种文化方法论上的创新,它又开拓了文化创新的时空,提高了人的文化创新的自觉能动性,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11页。

②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③《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5页。

④王成:《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成逻辑、价值彰显与基本经验》,《海岳学刊》2023年第1期。

⑤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习近平文化思想站在历史潮头,紧扣现实,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本问题作出了新的历史性的回答,既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也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接续方法论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两个结合”“新的文化生命体”“党的文化领导权”“文化自信”“历史自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一系列新的文化概念和文化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坚持,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创新、开拓和发展。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使命

指导人的社会实践走向成功,理论的价值才能实现,而理论价值的实现,就是理论的使命。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有着确定理论使命的理论。

(一) 坚持走自己的路,实现精神上的完全独立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第一个理论使命,就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性,规划好新时代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部署,确保中华民族实现精神上的完全独立。

“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坚持走自己的路,排除探索路上各种干扰,保持政治定力,才真正意味着实现了精神上的完全独立自主。如果不能基于本国国情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一味模仿照搬他国经验,那么它就谈不上有什么文化主体性,即使获得一定的发展,这种发展也必然是短暂和片面的,并且不属于本民族文明延续的成果。“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②坚持走自己的路,是文化主体性的集中展现,也是建立文化自信的首要的实践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基于中国实际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个成功足以说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力量和前景,也足以驳斥各种崇西向洋、僵化停滞的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怎么来的?就是走自己的路走出来的。如果没有充足的自信,探索中必然左摇右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每一种文化都是在坚持走自己的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文化自信的确立,又必将推动人们继续勇敢而坚定地开拓出新路。

坚持走自己的路必须做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党的二十大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提高到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高度。中国共产党不但要领导人民实现物质生活上的共同富裕,也要领导人民实现精神生活上的共同富裕。只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时丰裕,人民才能充分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生活的丰裕,人们的精神生活要求也提高起来,文化供给不足现象时有出现。精神文明滞后于物质文明的发展,是文化主体性不足的表现。实际上,我们有着极丰富的文化资源基础条件,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都可以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完善和发展奠定基础,也可以为建设同物质文明相协调的精神文明提供前提条件。

坚持走自己的路必须努力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人的现代化。习近平文化思想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目标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结合起来,不但把人看作是文化生产的主体,而且把人看作是精神享受的主体,实现了人的主体性的回归。

(二) 用好“法宝”——继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路走来,靠的是党领导人民在实践中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未来中国将向何处去、如何去,仍然要靠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中国特色”,而“中国特色”形成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方法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制胜“法宝”。指导党和人民用好这一“法宝”,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大理论使命。

^①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②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新时代条件下继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一要坚守理论创新的“魂”和“根”,构建中国的文化实践理论^①。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创新的“魂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党的理论创新的“根脉”,把两“脉”都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老祖宗”,一个也不能丢,做到“守正”。二要及时科学解答时代新课题,即积极主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具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在时代的实际中发现问题、解释问题、解决问题,将这些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做到“创新”。三要使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科学的理论必须是系统自洽的有机整体。马克思曾说他的著作是一个“艺术的整体”^②,列宁也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整块钢”^③,碎片化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阐释要大众化、通俗化和简明化,但理论的创立则必须经过系统化、学理化的论证。党的理论创新必须遵循理论创立的科学规律。马克思主义在开放发展中总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呈现出发展成果,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并不是发展中渐次出现的成果的简单堆砌,而是一经出现就以一个完整体系的面貌示人,人们如果不从整体上来认识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它。这里的“整体”不是指具体内容的完全,方法、理念、框架、目标、线索、主题等一系列抽象内容的形成和完备。这些抽象内容需要严密的逻辑论证。理论源于实践,但实践经验并不能自发地上升为理论,从一般实践经验到科学完备的理论体系,中间必须经过严密而深刻的学理研究和逻辑论证过程。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体系性的概括和逻辑上的论证,就是这样一个学理化建设的过程。四要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智慧。理论来源于实践,而人民群众则是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既创造物质财富,也创造精神财富。如果理论的内容不能反映人民的利益要求,不能汲取人民的经验和智慧,那么无论它被论证得多么精彩,都迟早要被历史所否定。习近平指出:“人民群众身处实践最前沿,对实践变化感知最敏感,感受最深切,也最聪慧,只要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就能豁然开朗,找到答案。”^④

(三) 担负“新的文化使命”——推进文化繁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文化是一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全面反映,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和经济持续进步的精神动力。一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追求发展的社会,必然也要积极追求文化的发展,并通过文化发展推动政治和经济进步。早在1941年初,毛泽东同志就曾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使命:“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就十分重视领导文化建设,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能结合实际提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纲领、目标和政策,领导群众把文化建设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又站上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起点,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⑥担负新的文化使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主题^⑦。

文化繁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质特征之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传统与现代的接续,本土与外来的交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合理的批判继承和交流借鉴,是社会主义社会文化繁荣的基本要求也是基本特点。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应主要反映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愉悦人民群众的身心,并且向着最有利于人民利益发展的方向引导和教育大众。尊重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创造力,激发人民群众在精神生产中的活力,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①丁立群,周文迪:《构建中国的文化实践理论》,《文化与传播》2024年第5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页。

③《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④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求是》2023年第20期。

⑤《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3页。

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⑦齐卫平:《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主题》,《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强国的基本途径。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文明推动历史发生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和可持续发展瓶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属于资本主义文明的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创造性地解决革命、建设、改革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过程中累积文明成就而形成的全新的文明。这种全新的文明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在现代的接续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发展弊端基础上进行的文明创新,也是发展中国家在各种全球性问题和各种发展束缚中跳出资本主义文明的固有思维而闯出的一条人类文明新路。

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观察、解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从理念、方法、话语、战略部署和策略要求等诸多方面发展了党的文化建设理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实现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完全独立、科学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方法论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使命。

The Theoretical Mission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Culture from the Marxist View of Culture

HOU Huiya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224051,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ulture and people, culture and society, and culture and history are the fundamental issues in the Marxist view of cultur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entral Committee, led by Comrade Xi Jinping, has placed great emphasis on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y have adhered to the stance, viewpoint, and methodology of the Marxist view of culture, upholding it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breaking new ground, and putting forward significant concepts such as cultural confidence, cultural leadership, and the two combinations. Under the new condition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y have maintained and developed the Marxist perspective on culture, forming the new cultural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known as *Xi Jinping's Thought on Culture*, which serves as a guide for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In this day and age, the theoretical missions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Culture include the complete independ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ethodology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the Marxist view of culture, Xi Jinping's Thought on Culture; theoretical mission

(责任校对 王小飞)